

584084

责任编辑 徐 侗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上海市文学获奖作品集

1982—1984 年 理论 评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73,000

1986年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书号 10299·009 定价 0.70 元

目 录

创作论：从政治性到认识性到审美性的发展…周介人（1）

净化人的心灵……………李子云（27）

——读《宗璞小说散文选》

病树前头万木春……………程德培（37）

——读李杭育的短篇近作

曹冠龙的小说创作……………许子东（46）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王元化（57）

王蒙小说思想漫评……………吴 亮（66）

作家的“自我”与“非我”……………张德林（77）

独特的生活画卷……………毛时安（87）

——程乃珊小说漫议

道德化的痛苦与历史发展的阵痛……………李其纲（99）

创作论：从政治性到认识性 到审美性的发展

周 介 人

周介人 男，上海市青浦县人，1942年5月生。195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作协上海分会《收获》编辑部工作。1977年后，一直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当理论编辑，现任《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近年来侧重于研究文学观念的变化。1985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象近六年来这样一个短篇精品、中篇佳构、长篇巨制共同繁荣、互相辉映的三足鼎立时期。创作实践的大踏步前进，有可能使我们重新来检验过去用熟了的创作理论，并用新的经验、新的结论来修正和充实它。

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创作论是一种带有政治性质的创作论。这种创作论强调根据政治路线的需要来选择题材；强调文学作品如何宣传方针政策；强调人物塑造怎样体现阶级属性和政治品质。这样的创作论是在一个需要用血和火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搏斗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文学环境中形成的，因此不能说它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没有道理，更不

能否定它在指导特定时期的文艺创作时所发挥过的战斗作用。

然而，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道路后，终于积累起了进行自我反思的各种可能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于是，我们终于认识到，仅仅在政治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创作论是大大不够了。因为，艺术固然不能脱离政治，但艺术也并不等于政治。于是，要求把创作论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样一种创作论要求文艺从服从于政治，转移到服从于生活。而生活现象是丰富的，所以文学创作的题材、人物、风格也应该多样化；生活现象又是芜杂的，因此艺术所选择和描写的现象，只是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的现象。这种创作论还强调：艺术和科学一样，其任务在于通过现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因而真实便是艺术的生命。显然，这样一种认识性质的创作论要比政治性质的创作论更加切合艺术的本质，更接近艺术的特殊规律。因此，今天我们文艺界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就是用这种认识性质的创作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编辑、评论工作的。

然而，作为一个文艺编辑和文艺评论写作者，当我用这种认识性质的创作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时，又常常会遇到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

例如，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样一类作品：它所展现的生活现象不能说不丰富，作家的知识面也不能说不广博，然而，整个作品显得零碎、分散，仅仅反映了生活表层性的面貌。于是，我们会告诉作者：“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要求作者进一步依据社会本质规律对作品进行提炼。

当作者根据要求进行“提炼”而再次把作品送到编辑部时，我们突然发现它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作品的枝蔓虽然干净了，它的血肉却干瘪了；艺术的描写虽然集中了，形象却简单了；主题思想虽然鲜明了，艺术感染力却反而不如以前了。

于是，我们又马上给作者开出新的病情诊断书：生活不足。要求作者再到生活中去捕捉与补充形象。

作者非常虔诚地到生活中去到处寻觅，却常常感到无从下手，难以同原来的创作意图对号。稿子无可奈何地搁了浅，原来的创作激情渐渐地冷却下来。那时，我们会责怪作者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不够典型，缺乏生动的创作素材，并搬出这样一套证明的理论：“如果作家所结识的对象穷酸、贫瘠而又惨淡，想摇撼他的心旌，激起他的创作灵感，引起他的创作冲动是不可能的。”

作者们似乎顿有所悟，于是，他们在生活中到处采访、寻觅那些典型的材料。不错，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确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事件、典型的人物。然而，无论是先进的生活典型，还是后进的生活典型，比起大量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来，它终究属于少数。于是，两耳不闻身边事，一心只想找典型的作者们便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常常苦恼于别人老是同他“抢材料”、“撞车”；要么成天埋怨自己生活和工作环境不理想，找不到创造艺术典型的材料。多少年来，我们的创作论造就了为数不少的这样一批作者：由于他们只想从生活中拾取现成的“典型”，拾取“斗金”，而不知道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中“沙里淘金”，所以只能步那位守株待兔者的后尘。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正当一部分作者在为寻找本质的

现象、典型的现象而焦躁不安的时候；另一部分作者却埋头苦干，左右逢源，他们几乎是悄然无声地从地上拾起别人熟视无睹、不以为意的材料，甚至是拾起别人表现过或者舍弃了的材料，构思谋篇、缝制新衣、铸成佳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优秀短篇小说《班主任》就是这样出现了。它使我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我们习惯的创作论，作品最好是描写一位教育战线上的正面的领导人，在一个典型的事件上与“四人帮”的爪牙正面冲突，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主题；或者至少是写一个小流氓怎样打群架，砸坏了多少课桌和玻璃窗，才能直接地表现出“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主题。然而，作品并没有选择和描写这种典型的生活现象。刘心武恰恰主要地不是从一个坏学生，而是从一个好学生身上去揭示“四人帮”的精神毒害的主题。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是那样地品行端方、工作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然而严格得近乎偏执与僵化。这样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和老年人，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不是随处可见吗？可是谁也没有想过其中可能蕴含着的发人深思的生活本质内容。然而刘心武却发现了，他几乎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地把这样一个好学生同小流氓宋宝琦联系在一起，使你不得不相信：在这两个品行截然相反的学生身上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精神的畸形，而这正是“四人帮”毒害的结果。

接着，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又问世了。它歌颂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陆文婷在其悲剧性命运中所显示的心灵美。如果按照我们流行的创作论，那么作家应该选择一起“左”的路线执行者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然后写陆文婷同“左”的路线的斗争，才更能表现出新人物的心灵美；或者描写马列主义老太太如何轻视

知识分子，不愿依靠知识分子，才能更典型地反映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艰巨性。然而，湛容同志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作品中没有出现一个我们常见的那种对知识分子凶相毕露的典型形象；即使是马列主义老太太，也不但不反对陆文婷，而且还要死死地依靠陆文婷，要利用陆文婷的技术来为她心目中的“革命事业”——她的丈夫焦部长服务。至于陆文婷呢，她更没有拿出气壮山河的反“左”斗争行动。她只是在手术台上连续地、紧张地、专心致志地为病人们解除痛苦。然后放下手术刀，系上蓝围裙，在她那个十来平方米住了四口人的小屋中为孩子和丈夫操劳。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能坐到一张三口人轮流用的书桌旁钻研自己的业务。是的，作家选择的那些生活材料实在近乎“穷酸”与“零碎”，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几乎是描写最为平常、最为表面、最为琐细的生活现象的作品，却使我们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它既使我们看到了革命言词在某些人身上的异化，又使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内容在这一代人身上的深化：陆文婷用自己瘦削的双肩所挑起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务与业务，她挑起的是曲折的历史放在一代人身上的共同的重任。

在短篇与中篇竞相争放的同时，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了。如果按照我们惯用的创作论，那么作品应该正面描写工作组长颜少春来到葫芦坝后，怎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郑百如的问题，才能更深刻地反映出七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那一场曲折而复杂的斗争；或者应该以金东水这样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坎坷经历为主线，才更能表现农村中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战胜的本质力量；然而，周克芹同志似乎是故意避开了以往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常常根据政治运动

发展线索来选择和组织材料的习惯写法。他异乎寻常地将一个被葫芦坝的政治斗争所遗忘了的人物——许茂老汉作为主角。这个人物在五十年代曾经是“爱社如家”，同党同心同德，但到了七十年代却变得爱钱如命，同上级离心离德；甚至是那样地远离斗争的漩涡，只是“在空隙里生活着和发展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远离本质斗争的人物形象，却又蕴含着多么新鲜的历史内容。如果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是一个对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抱着观望、疑虑之心的农民典型的话；如果说梁生宝是一个对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抱着坚定忠诚之心的代表性形象的话；那么，许茂之心则既不是疑心，亦不是忠心，而是一种伤心。他的那种独特的伤心感，在作品中虽然只是通过道道地地的“家务事，儿女情”，甚至是比较陈旧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但却反映出广大农民在遭受“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多年干扰之后心头萌生的失望、愤懑与反抗，从而映照出亿万农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渴望和追求。

当然，我所列举的那几篇作品在美学上和在表现的历史内容上都还不是完美无缺的。象《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艺术冲突的组织与开展甚至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然而，不管怎样，它们总是新时期的、表呈着新经验的文学潮头的代表。它们证明：尽管人们常常把生活现象分成本质的现象（或切近本质的现象）与非本质的现象（或远离本质的现象），然而，真正独创性的作家却总是要越出传统观念对生活现象所划分的这种框框；而且常常在别人以为是非本质的、远离本质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现象中，发掘出新鲜的历史内容，从一个新的角度打开观照社会本质规律的窗口，从而叫世人赞叹：“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它们还证

明,我们以往流行的创作论存在着两个比较大的缺陷:第一,在创作客体方面,由于我们对“生活本质”的理解上存在着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因而无法科学地解释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形式;第二,在创作主体方面,由于我们只顾及了作家作为一个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而忽略了作家作为一个审美主体的创造性,并且往往用认识的能动性来代替审美的创造性,便不能圆满地解释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许多更为隐蔽、更为复杂的环节;人类精神生产的这一个部门中,至今还存在着大量的工程未知数。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克服以上两个缺陷,我们的创作论将不但不能指导创作,不但落后于创作,而且将束缚创作。而要克服以上两个缺陷,我们的创作论必须完成从政治性到认识性到审美性的发展过程。

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前辈的作家与文艺理论家发现了流行的创作论的种种弊端,并且为了纠正这种弊端而作过不少可贵的、有益的探索。例如,五十年代被批判过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文学即人学”论;六十年代被围剿过的“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等等,实际上都是企图在创作论上匡正时弊,进行新的探索的表现。但是,一方面是由于受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干扰,另一方面是由于受我国当时美学研究水平的限制,这样的探索未能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现在,党中央已经为我们创造了进行学术研究的良好政治环境。在美学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也逐渐普及,许多同志不再把美仅仅看成是一个纯形式性的、纯主观性的或纯自然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从“人化的自然”中、从真与善的统一中、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

统一中去理解美的本质。这样，我们就完全有了可能去继续过去的探索，将文学艺术的创作论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上。

二 关于创作客体

文艺创作的客体，是纷纭复杂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现象与部分自然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性的创作论与审美性的创作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两种创作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文艺作为认识，它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通过现象认识生活的本质；而后者认为，文艺作为审美认识，它不仅要帮助人们把握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要给予人们比“本质”更多的东西。否则，只要有冷静的、抽象的、思辨的科学就行了，又何必来感情激荡、浮想联翩、如醉如痴的艺术创作呢？

由这种差异，就产生了两种创作论对待客体世界的不同的态度。前者始终把确立正确的主题思想，表现鲜明的主题思想放在创作任务的第一位。它把客体世界中的人与人的现象，仅仅看成是能够用来表现既定主题思想的一种工具。审美性的创作论则认为：不能把客体世界中的人与人的现象，仅仅当作解说主题的“工具”去掌握。它尊重人与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它认为创作的主题应该服从这种丰富性，而不是牺牲了人的丰富性去服从主题。它认为，创造艺术的目的和手段都离不开客体世界中的人。因为只有典型地描写人，表现人的性格、心理、思想、命运，才既能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的本质，又能给予读者比本质更多的东西。

由对待创作客体的不同态度，又产生了这两种创作论对于创作客体的不同的需求。

审美性质的创作论认为，作家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从生活中捕捉那些通过人的性格、心理、行为而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本质之间那无限丰富、无限多样、无限发展着的联系形式，并且把这种联系形式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提炼、集中、改造，使这种联系形式以更加特殊、更加个别、更加典型的感性面貌呈现出来。因为只有在这种加以概括了的个别的、典型的感性面貌中，才不仅包含着本质，而且包含着本质所不能完全界说的个性内容。这种个别的、典型的感性面貌就是艺术美。

艺术美不是象本质那样，仅仅是理性的，而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艺术美不是象本质那样，仅仅是事物的共性，而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艺术美不是象本质那样，仅仅具有客观性，而是艺术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总之，艺术美是一种生气灌注的完整体。艺术家是通过这个完整体来向世界说话的。

认识性的创作论则往往不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由于作家只面对主题思想说话，所以它强调从生活中捕捉现象与本质之间那种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联系形式（例如，一般地说，“四人帮”对青少年的毒害是通过什么现象表现出来的？又如，思想僵化的同志有哪些共同特点？再如，“左”的干扰对农村的影响有哪些普遍性的表现等等），而且趋向于把这种联系形式固定化、标准化，以为这就是现象与本质之间唯一“典型”的联系形式。这样，“一种事物一个典型”“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事物一种典型”的观点，在其“典型观”上，是将典型等同于本质，因而取消了艺术典型的无限丰富性与无限多样性；在其“本质观”上，则是把本

质理解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凝固体。这样，本来是现实的、客观的、发展的本质，就渐渐地被主观化、变成人用以衡量现象的一种“程式”。凡是合乎这一“程式”的现象，就称为“本质的现象”或“切近本质的现象”；凡是不合乎这一“程式”的现象，就称为“非本质的现象”或“远离本质的现象”。从而使得作家在复杂的、变化着的生活现象面前越来越感到迷惘，常常无法理解也无法反映生活中日新月异地涌现出来的、大量越出旧轨的现象形态。似乎“世风日下”，“非本质现象”与“远离本质的现象”越来越多，而可写的“本质现象”则越来越少，似乎世界在脱离“本质”而运动。可见，某些自以为是坚持“认识本质”的同志，常常会发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是他们自己渐渐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所谓现象与本质的脱离，实际上正反映了作家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脱离。

某些同志所以会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来理解“社会本质”，其哲学根源在于：

一、是由于常常将事物的本质等同于事物的性质；

二、是由于把事物的本质理解为只有一种常态，而不承认事物的本质“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它本身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有发展的阶段性，有一个呈现层次差异的系列。而且，常常在旧质中成长着新质的萌芽；在新质中残留着旧质的碎片。

什么叫本质？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毛泽东《矛盾论》）

可见，所谓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是把握事物内部特殊的矛盾，就是把握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和“媒介”。

由于矛盾在运动着，所以把握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把握事物运动的方向和发展趋势。

例如，要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要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要分析社会主义与残余的封建主义影响的矛盾；就要分析这些矛盾的两种政治表现形态：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之间的矛盾；并要分析这些矛盾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我们认为，只有把握了这些特殊的矛盾和它的发展方向，才算真正认识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本质。

那么，什么是“性质”呢？《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可见，所谓把握性质，并不等于把握事物矛盾的全部，而是把握事物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唯物辩证法为什么要求重视事物的性质呢？这是为了使人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不至于模糊了自己的视线，迷失了方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矛盾与从现象上罗列社会矛盾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求认清，在矛盾各方中是谁规定着发展的方向；后者则面对迷离混沌的社会矛盾而找不到决定性的东西，找不到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当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出现自然主义倾向的认识原因。

二、社会性质是由社会本质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规定的。社会本质这个概念已经在内涵和外延上包含了社会性质。人们如果真正把握了社会的本质，那么也就一定把握了社会的性质。

三、但是，不能将社会的性质等同于社会的本质，不能将部分等同于全体。如果将本质仅仅归结为性质，那么就会将事物内部矛盾中不规定事物性质的那一个部分、那一个方面误称为“非本质”方面或“远离本质”的方面；将显现那些部分或方面的现象误称为“非本质”现象或“远离本质”的现象，从而不利于对事物本质进行全面的、辩证的观察与反映。

四、即使性质相同的事物，由于它们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各不相同，所包含的内部矛盾亦不尽相同，所以在本质上仍然各有其特殊性。例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根据当时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而，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特殊的社会矛盾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从事上述内容的斗争，而且还包括了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残留着的封建主义影响的斗争。如果看不到性质相同的事物，在本质上仍可能各显特殊，我们就无法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就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然而，以往流行的创作论却往往用“性质”去代替“本质”。于是，在题材选择上就只准从规定社会性质、规定事物性质的那一部分生活内容中去选材：写新社会、写革命队伍只能写光明面、积极面，写旧社会、写旧营垒只能写阴暗面、消极面；特别是写历史题材，只能写“逼上梁山”式的作品，如果写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就会被指责为“歪曲历史的本质”。文学艺术本来应该面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应该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矛盾方面、不同的社会矛盾层次、不同的人物关系与不同的角度去织成触及社会本质的经纬交叉的网络。然而，在“性质”等于“本质”论的规范下，生活的丰富性、社会的立体性、历史的真面

目，都被题材的单调与表现路子的狭窄掩盖了。

用性质去代替本质，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就只强调突出人物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忽视每一个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具体的本质、具体的个性；忽视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思想意识渗透而造成的人的性格、心理的复杂性与可变性，使人物形象趋于类型化。许多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只有熟识的一面，没有陌生的一面；只有料定其必然如此的一面，没有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一面；似乎人只是按照共同的阶级性在行动而没有只属于自己的那种“秘密”与逻辑；似乎生活中的一切原本是那样简单而又明了的。于是就无法让读者理解：为何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的心灵之锁还是那样难以打开？人与人的矛盾还是那样难以排解？以至在人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为何还有那么多解不开理不清的千古之谜？

特别在指导反映当代生活的文艺创作时，“性质等于本质”论更束缚了作家的手脚。

有些同志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一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那么，前十七年、十年内乱、最近六年的社会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所以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本质”；因此，写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就背离了社会的本质。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三：

首先，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集中地出现某种现象，决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同社会本质中的矛盾联系着，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林彪、“四人帮”的出现亦是如此。我们只能说他们是社会内部矛盾

运动(本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但不能说他们是与社会本质无关的特殊现象。

其次,现象具有二重性。现象一方面显现着本质,一方面又覆盖着甚至用颠倒的形式覆盖着本质,所以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通过现象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者虽然描写了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种种现象,却未能揭示出社会本质的个人认识上的原因。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把作者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粗浅,归罪于客观现象本身“不反映本质”,从而否定客观现象总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表现着社会本质这样一个客观真理。

再次,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一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有些旧的矛盾逐步解决了,有些老的矛盾钝化了,有些新的矛盾产生了,因此,社会的本质在其发展的长途上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施展反革命阴谋,打倒老干部,镇压人民,因此,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当时我国社会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这种严重对抗的、席卷全社会的政治斗争形态在十七年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因此,就使当时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即本质显示出特殊性来。我们今天称那段历史为“十年内乱”,就是对这种矛盾特殊性的概括,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在其发展长途上显示出曲折性的概括。我们在观察十年内乱时,一方面要看到,由于在当时那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中,党和人民的力量在总

体上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因此当时社会的性质同十七年、同今天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性质的共同性中却包含着本质的差异性。如果看不到性质的共同性，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党、人民、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如果看不到本质的差异性，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党和人民一致认为，十年内乱是历史的倒退，而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是历史的伟大转折、是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把林彪、“四人帮”的出现说成“不是社会本质”、“是特殊的社会现象”，对于创作实践也产生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它设置了一种题材禁区，使作家们不敢用历史的眼光，继续深刻地总结和反映十年内乱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生怕以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为题材，就不能反映甚至背离社会本质。

即使在某些反映十年内乱的作品中，也往往不能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从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这一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往往把这些灾难的发生仅仅归结为少数国民党残余分子、流氓坏蛋的捣乱与作祟，使读者不能理解，为何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能够呼风唤雨，把温暖如春的中国搅得周天寒彻。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由于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昨天，必然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甚至明天。既然把林彪、“四人帮”的出现理解为与社会本质无关的特殊现象，那么就会天真地认为，只要扫除了这样一种完全偶然性的特殊现象，社会就可风平浪静地发展。这样，就不可能深刻认识新时期中社会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与四化建设的艰巨性。这种复杂性与艰巨性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党中央对于